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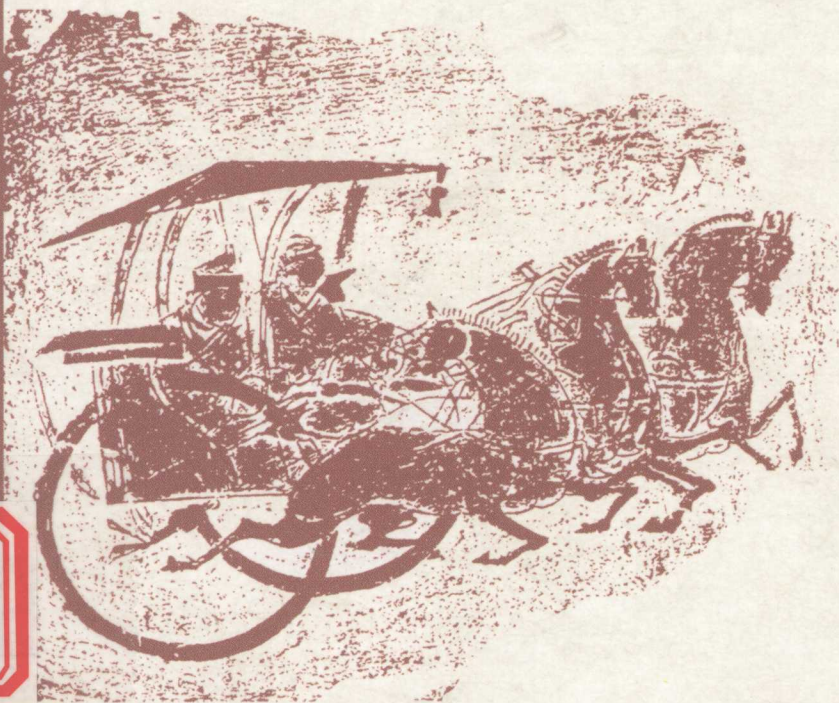
《文心雕龙》解读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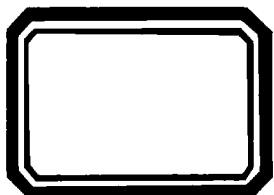
袁济喜 陈建农 编著



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字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文心雕龙》解读

袁济喜 陈建农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解读/袁济喜,陈建农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9809-8

I. 文…

II. ①袁…②陈…

III. 文心雕龙-文学研究-教材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731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文心雕龙》解读

袁济喜 陈建农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5.5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7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作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精神，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建构和谐社会，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所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得提升。所选书目，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来选定。书的编注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师为主，部分作者则为在国学院任教的人大其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邀请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学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些教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倾心编注了这套教材，表现出对国学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投入。

本丛书已列入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得到项目资金的支持。这对编好出好这套丛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重振国学、弘扬国学方面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支持力度。

这套教材的编写，如同人大国学院其他工作一样，均具有筚路蓝缕的探索性质，尽管我们已在主观上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使这套丛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共同推进国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2008年6月

目 录

导论	1
原道	16
征圣	26
宗经	34
正纬	43
辨骚	50
明诗	59
乐府	70
诠赋	80
铭箴	90
诔碑	100
哀吊	109
史传	118
诸子	136
论说	147
檄移	162
章表	171
神思	181
体性	190
风骨	199
通变	208
定势	217
情采	227

熔裁	236
声律	244
丽辞	253
比兴	261
夸饰	270
隐秀	277
养气	287
附会	294
总术	302
时序	311
物色	333
才略	343
知音	363
程器	374
序志	385
主要参考书目	397

导 论

本书系《文心雕龙》的选本解读。《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其内容博大精深，体系完备，不仅全面总结了南朝齐梁以前各类文体的源流和文章写作的丰富经验，而且还贯穿了作者对人文精神的深沉思考和执著追求，其开阔的视野，恢弘的气度，使它超越了一般的“诗文评”类著作，成为一部重要的国学经典。为了解读这部经典，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加以认识。

一、刘勰的生命体验与《文心雕龙》的写作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文论家。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原是东莞莒人（其治所在今山东省莒县），但他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出生于一个下级官吏的家庭，祖父刘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但刘灵真的事迹已无可考。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职位不高，很早就去世了。因此刘勰的家境贫困，也没有婚娶，很早就在定林寺依附当时的名僧僧祐，协助他整理、编定佛教经典，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刘勰笃志好学，又博通经论，这为他写作《文心雕龙》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关于刘勰的生卒年，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元

年（公元465年）前后，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或之后的若干年（当代有学者认为刘勰卒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文心雕龙》成书的年代，据清人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大约成于南齐末年（今人也有观点认为成于梁代初年）。了解刘勰早年的这一段特殊经历以及《文心雕龙》至今无考的确切写作年代，对于解读这部经典是至关重要的，它说明刘勰早期在孤寂中养成的性格，以及他以书寄志的心态。

刘勰对他自己精心写成的著作是极为看重的。据《梁书》本传记载，书成之后，“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大概正是由于沈约的赏识和推荐，梁武帝天监初年（公元502年），刘勰“起家奉朝请”，虽然这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奉朝会请召的闲职而已，但他从此开始步入仕途，先后担任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县令、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一直做到步兵校尉。他与萧统也有交往，史书上说“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但刘勰最后还是在奉命完成撰经的任务后，于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可见，刘勰的一生并不得志，政治地位始终不高，这与他“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程器》）的远大理想相去甚远。大概正是由于人生的悲凉，仕途的失意和对佛教的信仰，使他最终选择了出家（如果刘勰卒于公元532年前后，那么他的出家也与萧统的去世有关）。

总之，从入寺，到做官，再到出家，这就是刘勰一生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他早年入寺是为了“待时而动”（《程器》），立志有所作为，但是到了晚年又重回定林寺，这个结果无疑带有一种悲剧的意味。东晋南朝是一个非常看重门第的时代，高门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寒门庶族在仕途上却往往受到歧视，地位也不稳定，士庶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程器》篇中就透露出这一点，所谓“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谗”；此外，在《诸子》篇中他感叹自己“身与时舛”，在《史传》篇中又批评史家不能“按实而书”，任意褒贬，所谓“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其实也有借题发挥，寄寓身世之意。刘勰在《程器》篇中提出：“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这正是他理想人格的

写照。所以在他无法实现“奉时以骋绩”的愿望时，只能“独善以垂文”（《程器》），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写作中，正如他在《序志》篇最后所说的“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刘勰的人生与写作历程，其实正是传承了古代自孔子开拓的“诗可以怨”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传统，是中国古代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心态与人格的展现。同样，《文心雕龙》作为经典的传承性首先来自于这种优秀文化精神的泽溉。

刘勰之所以写出这部经典，不仅是因为他有着特殊的生命体验，深刻的思想见识与卓越的写作才能，而且也是汉魏以来文学发展与文学评论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汉魏六朝时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当然也留下了令人反思的教训，这些都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历史资源。同时，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便是文学评论的发达。魏晋文学评论既有哲学的指导，同时更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作为鲜活的源头。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集部“诗文评”类及其《文心雕龙》是这样评鹭的：“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于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作者从评价汉魏以来文章之学与诗文评的发展角度出发，认为《文心雕龙》主要是诗文评的代表作。近代著名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题辞及略例》中也指出：“论文之书，鲜有专著。自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杂论篇章。继此以降，作者间出，然文或湮阙，有如《流别》、《翰林》之类；语或简括，有如《典论》、《文赋》之侪。其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他们都指出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过程中的来龙去脉，肯定了他的成就。当然，仅仅从时代的必然性还远远不能说明与评价刘勰的贡献与意义，还应当看到刘勰在当时整个浮靡文风中毅然决然地担当起文学与文化批评的责任，以儒家当仁不让的精神人格去从事写作的可贵之处。其实，刘勰自己在《文心雕龙》的《序志》中也是这样叙述的：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珣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

《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论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

这说明刘勰对于汉魏以来文论发展的态势以及短长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是自觉地担当起文艺批评的社会责任，传承了先圣的忧患意识，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从而写出了这本流传不朽的文论经典，使汉魏以来的文论批评达到极致，彰显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经典中人品与文品的一体性品格。今天我们解读这本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经典，首先要传承的不仅是具体的论述，而是这种把生命体验与文论写作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二、《文心雕龙》的思想与文体特点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使他成为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依托这种思想去从事文学批评，远远超越一般就事论事的文学批评，充分彰显出国学的博厚渊明。后人说《文心雕龙》的特点是“体大思精”或“体大虑周”，是有充分依据的。刘勰的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朝，这是一个多元思想交流融合的时代。东晋以来玄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佛教则由玄学的附庸独立出来，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儒学在南朝又有重振的趋势。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玄、文、史四馆（见《宋书·雷次宗传》），梁武帝虽然佞佛，甚至把佛教奉为国教，但在统治思想上儒学仍是根本。刘勰的思想中兼有儒学、玄学和佛学的因素，这与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构成了《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兼容并包的气度与“唯务折衷”的方法。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包括作为“文之枢纽”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属于全书的总论；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属于文体论，论述各种文体的源流和体制，主要依据“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展开；从《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属于创作论，分别阐述有关艺术构思、风格体势、结构安排、修辞技巧等方面的问题；《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属于批评论（其中《物色》篇兼有创作论的因素），总结历代文学盛衰兴亡的规律，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阐述有关文学批评

的原则与方法等问题；最后一篇《序志》总结全书，叙述写作的动机、书名的含义和全书结构。各篇之间前后呼应，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系统而庞大的有机整体。其严密的结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清代学者章学诚称其“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按照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法，《文心雕龙》被列入集部的“诗文评”类。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文心雕龙》不是一般的“诗文评”，因为刘勰不仅仅是“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而且还倾注了他深沉的人文关怀，既有对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的继承，如忧患意识、宗经思想，也有对佛学精神的张扬，还吸收借鉴了魏晋玄学的思维方法，这些方面构成了刘勰的精神世界。而魏晋以来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促使他把“树德建言”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成为写作《文心雕龙》的重要原因。正如他在《序志》篇中所说的：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刘勰以“文心”来命名此书，说明他不是把文学（文章）单纯看做是“雕缛成体”的产物，而是从人文关怀的意义上彰显其价值。他认为，人具有超出万物之上的灵性和智慧，君子通过“树德建言”，把自己的心灵寄托在文章之中，就可以传诸后世，获得不朽。

刘勰对孔子是非常仰慕的，他在《序志》篇中回忆起自己“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正是在圣人的感召下，使他立志以“敷赞圣旨”为己任，通过“论文”的方式倡导儒家经典，纠正近代以来“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不良文风，使人们意识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之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在刘勰看来，这与东汉的马融、郑玄注经一样，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见，《文心雕龙》全书的宗经思想正是刘勰的人文理想和忧患意识的体现，它贯穿到各类文体的写作实践之中。

汉末魏晋以来，思想文化界呈现出多元与解放的态势，这使刘勰成为一个既讲传统又善于吸纳新潮的人物。在刘勰的精神世界中，佛教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梁书》本传说他“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又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此外，刘勰还撰有《灭惑论》一文，这是针对道教指责佛教的《三破论》（即所谓“破国”、“破家”、“破身”）而为佛教辩护的文章。《文心雕龙》一书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出佛教的立场，但全书体系完备，组织有序，与他在定林寺帮助僧祐整理佛经过程中所受到的严格训练有很大关系。范文澜指出：“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颉理明晰若此。”（《文心雕龙注》卷十）日本学者兴膳宏通过比较《出三藏记集》与《文心雕龙》两书，指出了两者在行文和用语上的种种联系，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的推断不是毫无根据的。^①

不过，佛教对刘勰影响最大的地方，恐怕还在于它对人文精神的深化以及人格理想的培养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政治和伦理色彩，是一种世俗文化，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而佛教以追求精神超越为宗旨，其对形而上的精神意蕴的弘扬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过于世俗的一面。佛教发展到了南朝的齐梁时代，佛学精神趋于浮靡与世俗。魏晋时期的佛学重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与精神的超越，而齐梁佛学重在满足统治集团的世俗心态的需要。梁武帝的崇佛也是如此。唐代高僧道宣论梁代佛学时，曾批评其浅露浮华，“于时佛化虽隆，多游慧辩，词锋所指，波涌相陵。至于征引，盖无所筹。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举”^②。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评价梁代佛教时指出：“当时风俗柔靡浮虚，不求实际。不但三玄复盛，佛学亦乏刚健朴质之精神，国势外象安定，内实微弱，梁武帝因此而亡国杀身。”^③而刘勰信仰佛教，钻研佛典，却与这些上层人士有所不同，他重在精神人格的提升。他在《灭惑论》中说：“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刘勰通过对比，深刻

① 参见《〈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见《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5～108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

② 《续高僧传·习禅篇》。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认识到佛教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上是道教无法相比的。此外，刘勰的老师僧祐是一个具有虔诚宗教情结的人，信仰坚定，人格高尚，这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精神境界与他原有的儒学信仰相结合，使刘勰成为一个思想深邃、意志坚定的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而随波逐流，正如他在《序志》篇末的赞语中所说的：“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南朝齐梁时期是一个普遍缺乏理想和信仰的时代，像刘勰这样的人很难得到世俗的理解，更无法实现他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所以他在《知音》篇中慨叹“知音难逢”，这也正是他最后离开官场，皈依佛门的重要原因。

由于佛教的潜在影响，使刘勰在《原道》篇中追溯人文起源的时候，一方面受《易传》的启发，从天地人三才的高度去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极力神化“道”和圣人的作用，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认为儒家经典是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产物，甚至把“河图”、“洛书”的传说也看做是“神理”的产物。于是经典的作用和影响就被他无限夸大了，如同广大无边的佛法，可以“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他又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虽然是借用了《易传》中的话来说明文辞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把它与佛教的影响截然分开。因为佛教也非常重视文辞的作用，例如刘勰的老师僧祐曾说：“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出三藏记集》卷一）《出三藏记集》虽题名僧祐所作，但根据《梁书·刘勰传》和《高僧传·僧祐传》的记载，可以推测该书的编订整理主要是出自刘勰之手，他对其中的内容肯定是非常熟悉的。此外，刘勰在《灭惑论》中说道：“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他看来，儒释两家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这种通达圆融的看法与大乘佛学中“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道”并非出自一家之说，与唐代韩愈以儒家正统自居、坚决排斥佛老的原道思想是不同的。刘勰在《诸子》篇中甚至把诸子之作也看做是“入道见志之书”，可见，《原道》篇中所说的“道”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既有来自《易传》的影响，也融合了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及佛教所宣扬的冥会“真如”、“法性”的最真智慧，具有超越万物、至高无上的特性。如果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某一家的观点，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魏晋玄学也对《文心雕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道》篇中，刘勰认为儒家经典是古代圣人根据自然之道制作出来的，把六经也看做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这实际上反映了魏晋玄学融合名教与自然的思想特点。《论说》篇中称赞夏侯玄、王弼、何晏等人的玄学论文是“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可见，刘勰非常欣赏富有创见性和思辨精神的玄学文章。他在《序志》篇中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正是对“师心独见”的最好说明。王弼在解释《周易·系辞上》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时提出：“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王弼对于《周易》中所说的大衍之数何为五十的现象作了自己的解释。他强调蓍占时所用的五十根蓍草中有一根不用，但是却起着总率全局的作用。这是用“以无统有”的观点来解释《周易》中的蓍占现象。应当指出，这种观点体现了魏晋易学的特点，与汉代易学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汉代易学沉溺于象数之学，感兴趣的是以繁治繁的方法，使本来就复杂神秘的易学更趋繁难。汉代的文论，如扬雄、班固的文论也大多是对具体现象感兴趣，他们的辞赋理论即表现出此种治学理路。而王弼直击事物本体、举本统末的哲学精神，直接启发了文论家的思路。《文心雕龙》的《序志》篇批评汉魏以来的文论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这些文论家在观点上都很激进，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但是在方法论上仍然沿用汉代的文学批评单篇杂论的体式，而刘勰要超越前人，除了观点上的创新外，更主要的是要运用新的方法，为此他自觉地借鉴了王弼的举本统末的方法来组织《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与理论体系。在《序志》篇中他指出：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圆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